

# 论《四库全书总目》对举业文献的著录

王玉超

(云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 举业文献是科举时代为应举备考而编纂的著述。《四库全书总目》根据编纂目的、功能、形式和编纂群体对举业文献进行了界定,并以清代朴学思想为标准,对举业文献进行分类和著录,分别收入《四库全书》或置于存目。其中,置于存目的举业文献占有绝对数量,四部分类以经部最多,子部次之。结合义理、考据和训诂三个方面评价举业文献,颇能看出举业文献的发展演变和优劣短长。

**关键词:** 《四库全书总目》; 举业文献; 清代朴学

中图分类号: K825.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5-0124-07

## On the Work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cluded in the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Four Kinds of Chinese Classics*

WANG Yuch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re the literature compiled for those who prepare to participate the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s.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Four Kinds of Chinese Classics* defined the works based on the purpose, function, form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mpiling. It classified and compiled the works with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Qing Dynasty as its standard. The work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cluded in the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Four Kinds of Chinese Classics* were classified, of which most wer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second was philosophy. Meanwhile,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Four Kinds of Chinese Classics* evaluated the work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bonding with argumentation, textual research and exegesis, and the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examination-books documents could be reflected.

**Key words:** *A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Four Kinds of Chinese Classics*; work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Qing Dynasty

举业文献是科举时代为应举备考而编纂的一类著述。随着科举与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举业文献渐入学术视野。综观中外学者的研究,大都集中于书坊出版、文学批评和古代教育等方面,至于举业文献的目录著录鲜有涉及。<sup>①</sup>举业文献遗存丰富,官私目录著录差异较大。官修书目排斥举业文献,著录有

<sup>①</sup> 台湾学者王福寿较早涉及举业文献的研究,其《科举的参考书》(《故宫文物月刊》,1990年,第4期)一文,梳理了隋唐至清代的主要举业用书;刘海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对科举文献类别和价值加以论述,其中包括八股文、试帖诗等备考科举的专门书籍;2009年新加坡学者沈俊平出版专著《举业津梁: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和流通》,日本学者井上进《中国出版文化史——書物世界と知の風景》专列“举业书”一章,台湾政治大学刘祥光先后发表《明文稿:科举时代的考生必读》《印刷与考试:宋代考试用参考书初探》《宋代的时文刊本与考试文化》,2010年张献忠发表《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等,均结合坊刻出版对举业文献进行分析。

收稿日期: 2017-03-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科举文化与明清知识体系研究”(编号: 16JJD750022)

作者简介: 王玉超(1982-),女,黑龙江双城人,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

限;私人藏书目多有收录,明代以来甚至出现单独著录的情况,如《宝文堂书目》设“举业类”,收录举业文献38种,清初《千顷堂书目》设“制举类”,收录举业文献43种;书坊目录所录举业文献最多,这取决于举业著述的备考功能和书坊的射利目的。其中,官修书目虽然收录举业文献最少,却最能呈现举业文献编纂与主流知识体系的关系,尤其大型官修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编纂于科举制度的成熟时期,对举业文献的著录、分类和评价具有鲜明的学术标准,反映了举业文献的发展演变和优劣短长。

## 一、《总目》对举业文献的范围界定

举业文献的范围界定到目前为止尚不明确,一般认为八股文、试帖诗选本和备考科举的著述即举业文献,<sup>①</sup>但从应举备考的功用看,举业文献还应包括与时文、策论写作相关的经史释讲类著述。举业文献既然有备考之用,必然形成以经史文本为核心,以集部文体为依托,以学术思想为根本的基本特征,举业文献因而明显区别于科录制度类文献、试卷档案类文献和载记研究类文献,例如《总目》著录的张朝瑞的《贡举考》,虽备列有明一代科举试题,但仍被置于史部政书类。据笔者统计,《总目》明确为举业文献的著述共313种,其中宋代18种、元代7种、明代171种、清代104种、时代不明者13种,主要从四个方面对举业文献进行范围界定,即举业文献的编纂目的、功能、形式和编纂群体。

第一 根据编纂目的界定。举业文献不受正统文人重视,但由于具有指导举业的功用而颇为流行,很多编纂者和评点者往往直言不讳,在序、跋,或凡例中直接言明备考之用。《总目》举业文献提要也多引原书序、跋或凡例,借以确定举业文献的类别,如《〈易酌〉提要》引原序“此书为经学之津梁,亦举业之准的”;<sup>[1][P55]</sup>《〈读易约编〉提要》注“其《凡例》有云:是编原为便举子业,凡可备大小试题者,著其精意,余止存经文。”<sup>[1][P118]</sup>《〈评史心见〉提要》注“其凡例云‘凡可以为策论者,择取以利于举业。’则其书可知矣。”<sup>[1][P1183]</sup>凡著述序、跋或凡例明言为举业而设者,无论是用于时文,还是策论,提要均直接引注,而不复评议。

第二 根据备考功能界定。凡具有应举备考功能的著述,即使编纂者未明言为举业用书,四库馆臣亦视之为举业文献。应举备考的习业阶段和程度不同,举业用书也相应地有所侧重和针对,《总目》主要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童蒙训课,重在了解“四书五经”本意;另一类是揣摩时文,重在掌握应考技巧。童蒙训课类举业文献,如《尚书口义》“于经文之内注小字以贯串之,大旨悉遵蔡《传》而衍以通俗之文,以便童蒙”。<sup>[1][P179]</sup>《孝经注义》“以《孝经》分章诠释。其训诂字义者标题曰‘注’,其敷衍语意者标题曰‘义’,词旨浅近,盖课蒙之作也”。<sup>[1][P420]</sup>蒙书自来有蒙稚卑小之称,元代朱德润《送周元礼任福州蒙古学正》一诗云“且陈平塞策,莫讲训蒙书。”<sup>[2](卷八,P5)</sup>据《四库提要》可知,童蒙训课类举业文献的特点是疏通文意、词旨浅近、文字通俗、便于诵习,这类著述于经典阐释无所发明,不过借解释经典之名,行举业指导之实。其他如《礼记提纲集解》《诗经集成》等揣摩时文类举业文献,则是直接针对应考而著,包含了经书拟题、文旨衍义、章节评点等内容,习业精优者可据以掌握文法,次之则借以敷衍成文。

第三 根据讲章形式界定。举业文献形式特殊,既不同于学术著作,也有别于文学作品,四库馆臣视为“讲章”体式。从《四库提要》来看,讲章体式包括尊功令、列试题、附评点、重技巧等,具体形式较为复杂,举业用书也并非一书而兼众体,或侧重某一方面,或兼备几个方面。首先,举业用书往往尊崇朝廷规定书目。明代以来,科举考试指定经书注本并布于功令,《明史·选举二》载记了“四书五经”所用注本,<sup>②</sup>《四书五经大全》成为永乐以后应考举子的必读书目,清沿明制,除乾隆二十二年(1757)增加试帖诗外,科举制度和主试文体变化不大。《〈三鱼堂四书大全〉提要》云“虽有明二百余年悬为功令,然讲章一派从此而开。庸陋相仍,遂似朱子之书专为时文而设,而经义于是遂荒。是编取胡广书,除其烦复,

① 刘海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2003年第32期)、陈长文《明代科举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均提出这一观点。

② 《明史·选举二》载“后颁科举定式,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张洽传,《礼记》止用陈澹《集说》。”

刊其舛谬。”<sup>[1] (P492)</sup>所谓“胡广书”,即永乐间胡广主持编纂的《四书五经大全》。《三鱼堂四书大全》以朱熹为宗,以《四书五经大全》为本,尽管力求减少《四书五经大全》的编纂错误,但义理阐释一脉相承,对功令文献的尊崇不言自明。其次,举业文献往往列举大量试题,不仅八股时文如此,策论表判亦复如此,如《书义卓跃》《麟经统一篇》等,或“每段必以‘此题’二字冠首”,<sup>[1] (P168)</sup>或“以经文之可作试题者,截其中二三字为目,各以一破题括其意”,<sup>[1] (P390)</sup>这类著述根据经书拟作试题,重在讲解题目,而非训释经书。《麟经统一篇》推测经书中可作试题者,大有八股猜题之嫌,《四库提要》认为它“在讲章下”,在举业文献中亦属不入品流者。《礼记敬业》因“丧礼不命题,士子亦弃而不读,乃并经文去之”,<sup>[1] (P306)</sup>删去《丧服小记》《丧大记》《奔丧》《问丧》等内容,《总目》据此判断此书“为举业而作”。这类著述所删篇目与丧礼凶讳有关,被认为不适合科考命题,明人对此早有指斥,如曹安云:“《春秋》不详崩葬卒葬,《礼记·丧服大记》等,多不考。”<sup>[3] (P5)</sup>李维桢说:“近来士子不务实学。如《易》之悔吝凶咎,《书》之《金縢》《顾命》,《诗》之变《风》、变《雅》,《春秋》崩葬卒葬,《礼记》奔丧问丧,以为讳而不谈。”<sup>[4] (卷一百三十四 P4)</sup>清初顾炎武《日知录》“拟题”条亦载:“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sup>[5] (卷十六 P386)</sup>《礼记敬业》删去奔丧、问丧的内容,显然缘于科举命题的习惯,四库馆臣亦深感“时文盛而经义荒”。再次,分章讲解、评论经义、批点文章、总结文法是举业用书的常用形式,因而为四库馆臣深恶痛绝。《读易镜》“经文旁加圈点,讲义上缀评语,亦全似时文”。<sup>[1] (P106)</sup>《尚书义疏》“亦高头讲章之类,抄本缀以圈点,其体段皆时文”。<sup>[1] (P180)</sup>批评圈点本是古人读书方式之一,如“宋人读书,于切要处率以笔抹”。<sup>[1] (P481)</sup>《直斋书录题解·古文关键》道:“吕祖谦所取韩、柳、欧、苏、曾诸家文标抹注释,以教初学。”<sup>[6] (P451)</sup>评点形式从读书之法到教学之法,再至举业文献盛行以来的备考之法,以致四库馆臣认为,循章讲解,圈点评论均属时文体段。这类著述不以经书本意为本,而用章节形式割裂经义,主要是为习业者提供方便。

第四,根据编纂群体界定。举业文献的编纂群体十分复杂,既有进士出身,也有终生未第者;既有身居权位、官至宰职者,也有坊肆商贾、布衣未仕者。从《总目》可以发现,三类群体编纂的著述最易被四库馆臣视为举业文献,即时文选家、课业塾师和书肆坊贾。宋代以来,很多文人因编选时文而闻名,也有凭借文名而编选时文的情况,如元代倪士毅,明代章世纯、金声,清代李光地等,四库馆臣对其“时文选家”的身份高度认可,称“(章)世纯与艾南英、罗万藻、陈际泰号临川四家,悉以制艺名一时,而世纯思虑尤锐。其诂释《四书》,往往于文字之外,标举精义,发前人所未发”。<sup>[1] (P475)</sup>章、艾、罗、陈是明末的时文名家,尽管他们并不是以八股时文而闻名于天下,编纂举业用书也并非仅为备考,但他们所探讨的古文与时文、义理与形式,借编纂举业用书矫正八股时弊等理论和主张,毕竟与举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著述采用时文体式,“标举精义”,提倡雅正,虽被视为举业文献,却多收入《四库全书》。相较而言,课业塾师在编纂水平上不如时文选家,《四库提要》鄙其为“乡塾课授之语”、“村塾讲章”等,《麟经指南》《易经儿说》等均被归入此类。四库馆臣认为,村塾讲章无论是诠释文句,还是推阐大旨,目的都在于了解经书文意,并不深入探讨义理本身,且很多著述“撮录成帙”,不出举业文献编纂之法。在举业文献编纂群体中,书肆坊贾占有相当比重,但所编纂的举业用书多被视为最无价值的一类。如《春渚纪闻》载:“(李偕)试罢,梦访其同舍陈元仲,既相揖,而陈手执一黄背书,若书肆所市时文者,顾视不缀。”<sup>[7] (卷一 P7)</sup>这一现象宋代已然,明清更甚。坊贾编纂的著述虽然并非尽是陋本,但绝大多数出于射利目的,编纂粗糙,常有讹谬舛误。

## 二、《总目》对举业文献的分类著录

《总目》对数量丰富、形态多样、内容复杂的举业文献没有一概摒弃,在以经学为核心的清代学术风气下,《总目》著录举业文献具有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其中,宋元著述因遗留有限,著录较少;清代仅至乾隆时期,著录数量亦相对较少;收入《四库全书》和置于存目的数量差异较大,总体而言,后者占有绝对数量;四部著录以经部最多,子部次之。

首先,《四库全书》与存目著录的数量差异较大。《总目》著录的313种举业文献,真正收入《四库全书》的仅占一小部分,绝大部分被四库馆臣置于存目当中,具体数量如表1所示:

表 1 《四库全书》收录与存目著录

类别\著作朝代	宋	元	明	清	备注
《四库全书》收录数量	9 种	2 种	22 种	7 种	其中明清御修 10 种
存目著录数量	9 种	5 种	149 种	97 种	时代不明 13 种
各时代总数	共 18 种	共 7 种	共 171 种	共 104 种	

如表 1 所示,《总目》著录举业文献具有明显的特征,即宋元少,明清多;《四库全书》收录少,存目著录多。宋元举业文献著录少,与文献遗存相关,而宋代数量超过元代,则反映了两宋时期科举之盛和备考著述之众。《宋会要辑稿·选举四》“政和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条载:

蝇头细字,缀成小册,引试既毕,遗编蠹简,几至堆积。兼鬻书者以《三经新义》并庄老、子说等作小册刊印,可置掌握,人竞求买,以备场屋检阅之用。<sup>[8] (P5320)</sup>

此条虽讲科场舞弊,但足以说明举业用书的盛行。自元代开始,举业文献置于存目的数量越来越多,明代存目占 87.1%,清代仅至乾隆时期,存目所占比例高达 93.2%。

《四库全书》收录与存目著录举业文献具有两个重要的划分标准,第一个标准即是否具有儒者治经的学术精神,也就是志存闻道,有功于圣贤。据《总目》所录诸篇《圣谕》可知,《四库全书》收录的著述需要“有关世道人心”,<sup>[1] (P10)</sup>由此可见,所收的举业文献也应符合这一要求,如明人蔡清人品端粹,学术精醇,四库馆臣认为所著《四书蒙引》“体认真切,阐发深至,犹有宋人讲经讲学之遗,未可以体近讲章,遂视为揣摩弋获之书也”。<sup>[1] (P473)</sup>此外,明代赵南星《学庸正说》、章世纯《四书留书》、清代陆陇其《松阳讲义》、杨名时《四书札记》,无不阐明经义,多所心得,发前人所未发,虽属举业著述,却仍被收录《四库全书》。相较而言,存目著录的举业文献则不具备以上诸种特征,不过循章敷衍、寻求语脉,于经义无甚发明。第二个标准即是否为奉敕纂修、皇帝御定。奉敕纂修、皇帝御定的举业文献共 10 种,其中明代永乐十三年(1415)胡广等奉敕纂修的《四书五经大全》,系据前代举业著述增删损益,四库馆臣称其“剽剟成编”,不但无关儒家义理,甚至有碍圣学,促成了举子不复研习经典,抱守其书而尽弃注疏的陋习。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sup>[5] (卷十八 P428)</sup>若按清儒治学的学术标准,《四书五经大全》理应弃之不录,或置于存目,但因属奉敕纂修,仍被分为 6 部,收入《四库全书》,并置于经部各类之首。另有清代康熙朝御定 2 部,乾隆朝奉敕编纂 2 部,这 4 部著述旨在厘定《四书五经大全》之外谬,实为清代举业指南。

其次,《总目》著录的举业文献以经部居多。各部数量差异,一方面取决于不同时期科举主试文体对举业文献编纂的影响,另一方面缘于《总目》对不同类别举业文献的著录倾向。举业文献的四部分类如表 2 所示:

表 2 已知时代的举业文献分类

类别\朝代	宋	元	明	清
经 部		5 种: 书类 2 种; 春秋类 3 种	92 种: 小学类 1 种; 四书类 16 种; 五经总义类 3 种; 春秋类 12 种; 礼类 13 种; 诗类 12 种; 书类 16 种; 易类 19 种	66 种: 小学类 1 种; 四书类 24 种; 五经总义类 4 种; 孝经类 5 种; 春秋类 7 种; 礼类 4 种; 诗类 4 种; 书类 4 种; 易类 13 种
史 部			20 种: 史评类 14 种; 史抄类 5 种; 编年类 1 种	7 种: 史评类 6 种; 史抄类 1 种
子 部	17 种: 类书类 10 种; 儒家类 7 种	1 种: 类书类 1 种	46 种: 类书类 20 种; 杂家类 4 种; 儒家类 22 种	26 种: 类书类 12 种; 杂家类 3 种; 儒家类 11 种
集 部	1 种: 总集类 1 种	1 种: 诗文评类 1 种	13 种: 总集类 12 种; 别集类 1 种	5 种: 总集类 4 种; 楚辞类 1 种
小 计	18 种	7 种	171 种	104 种

根据表 2,《总目》著录的已知时代的举业文献达到 300 种,经部有 163 种,高居首位。其中,宋代经部未有著录,元代著录 5 种,明代著录 92 种,这是由于元代确定四书五经为科试内容,它直接影响了明

清两朝的科举制度,使明代经部举业文献骤增;清代著录66种,数量略少于明代,但从举业用书的编纂和保存上看,有清一代至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各种举业文献的数量要远超明代。

具体来看,有几个现象颇为引人注目:一是《总目》著录明代四书类举业文献16种,清代虽仅至乾隆朝,却已著录24种,这与清代“首场为重,首场又以四书艺为重”的科考风气有关。<sup>[9](卷一百〇八 P3149)</sup>清代应考举子人数众多,考官阅卷量大,尤重四书的现象不断发生,导致举子特别注重《四书》文题的练习,四书类举业文献随之增多;二是明代《书》类和《易》类分别著录16种、19种,远远多于《诗》《礼》和《春秋》。明代科举考试五经占一,分房考校,但选考各经的人数不等,“万历十一年,以《易》卷多,减《书》之一以增于《易》。十四年,《书》卷复多,乃增翰林一人,以补《书》之缺。至四十四年,用给事中余懋孳奏,《诗》《易》各增一房。”<sup>[10](卷七十 P1694)</sup>五经难易不同,所受重视程度亦有差异。万历以来,习业举子对《易》《书》《诗》的选择增多,不仅表现在分房增多、考官增加的制度调整上,也表现在举业文献的编纂上;三是清代举业文献增加了《孝经》类5种,而明代未有著录。《清史稿·选举三》载“论题旧出《孝经》……(康熙)五十七年,论题专用性理。世宗初元,诏《孝经》与五经并重,为化民成俗之本。宋儒书虽足羽翼经传,未若圣言之广大,论题仍用《孝经》。”<sup>[9](卷一百〇八 P3149)</sup>举业文献的编纂绝非编纂者的个人喜好,而是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清初《孝经》纳入科举,特别是雍正朝将其与五经并重,直接导致了《孝经》类举业文献的增加。

《总目》著录子部举业文献的数量仅次于经部,子部又以儒家类和类书类居多。尽管在四库馆臣看来,儒家类举业文献对义理的阐释仍有未尽,但毕竟有裨经书。在举业文献范畴内,《总目》儒家类著述绝大多数与讲学有关,如宋代7种,除《分类标注朱子经济文衡》外,其它6种均为训蒙之用,且都是家塾训课。明清讲学之风尤盛,纪昀于《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三》中描写“相见辄讲学”的翰林某公,<sup>[11](P80)</sup>足以反映讲学风气的盛行。科举制度下,讲学不离举业,举业不离讲学,以备考讲学为内容的举业文献相应地流行起来。《总目》著录明清两朝子部儒家类举业文献共33种,无一例外,均为讲章之体,特别适用于授徒训导。

子部类书类举业文献多服务于策论的撰写,其中,宋代7种,明代12种,清代10种,另有不明时代者5种。策论是科举试士常设科目之一,自宋以来几度成为科试的主要文体,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引状》云“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工,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何者?利之所在,人无不化。”<sup>[12](卷九 P301)</sup>在苏轼看来,策论盛行与古文观念有关,其实,科举时代,无论古文,还是经义文、十段文、八股文等历朝时文,都要在儒家义理的基础上讲论问题,对经书、史料的熟悉是必要前提,而使用类书是掌握经史材料最简捷、最迅速的方法。策论尽管不是历代科举考试的主试文体,但既为常设科目,举子不敢无视,尤其当现行科举制度受到质疑时,策论往往成为首先考虑的取代文体,如康熙二年癸卯(1663)八月,曾改制“定试士不用八股时文,用策论制,分二场”。<sup>[13](卷十二 P372)</sup>策论在历代科举中地位稳固,针对策论的类书便相应产生并流行起来。

《总目》著录于史部和集部的举业文献数量有限。史部举业文献仍以策论为主,史评类居多,与类书类不同的是,史部举业著述均据历代史书编纂,重在历史事件的分析评价,很少进行单纯的历史文献归类。集部举业文献著录最少,大多属于时文、策论选本,侧重于为举业提供可资借鉴或模拟的范文。宋代以来,时文选本,汗牛充栋,官刻程墨以示范式者有之,坊刻杂收以射利者亦有之。很多举子将经史著述束之高阁,视时文选本为应考利器,猎词而取,拟貌而肖,科场八股尽录坊刻的现象不时发生。对此,正统文人多有指斥,明清朝廷屡次颁布坊间刻文之禁令,《四库全书·圣谕》对时文选本也采取弃之不选的态度,故这类举业文献几乎不见于《总目》。

### 三、《总目》对举业文献的评价标准

《总目》著录举业文献,其意义不仅在于保存著述,也反映了举业文献的演变历程、编纂特征和优劣短长,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四库馆臣所代表的清代朴学思想。以纪昀为总纂官的四库馆臣多宗奉清初朴学,长于训诂和考据,分纂稿纂修者翁方纲在诗学上提出“肌理说”,除讲究“文理”外,也把义理和考据视为诗文创作和著述评价的重要标准,即其《志言集序》所说“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

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sup>[14](卷四 P27)</sup>《提要》对举业文献的评价也一以贯之地倡导朴学思想,大体说来,有三个方面值得重视。

其一,义理仍是举业文献评价的重要依据。儒家经典的阐释研究,一直关乎历代学术发展,从汉代训诂、宋代义理,至明代心学,历代学者都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阐释经书,义理则在道德与学问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学术争论中始终处于核心地位。时至清初,虽然摒弃空谈、崇尚汉学的朴学思想重新兴起,但反对的是宋学的义理先行,并不反对在考校文字基础上的义理阐释。因此,能否发明义理仍是清代朴学家评价著述,包括《总目》举业文献的重要依据。

《〈书义矜式〉提要》案语称“此书乃科举程文,当归集部。然虽非诂经之书,实亦发明经义,入之别集为不类,故仍入经部附录中。”<sup>[1](P164)</sup>《提要》对《书义矜式》“发明经义”给予极大肯定,甚至以此作为举业用书置于集部与经部的划分标准之一。“发明经义”才足以羽翼经典,《尚书日记》《四书札记》等阐释经典、发明义理、自抒心得的举业文献,均被收入《四库全书》。王邦柱、江柅《易经会通》之类则被置于存目中,四库馆臣的理由是“随文衍义,罕所发明”,这些举业文献是应举备考的记诵之学,没有学术价值。四库馆臣于经部四书类之后附有案语:

至明永乐中,《大全》出而捷径开,八比盛而俗学炽。科举之文,名为发挥经义,实则发挥注意,不问经义何如也。且所谓注意者,又不甚究其理,而惟揣测其虚字语气以备临文之摹拟,……今所采录,惟取先儒发明经义之言。其为揣摩举业而作者,则概从删汰。<sup>[1](P481)</sup>

制义本为阐释儒理,重在究其义理,发挥经义,若仅临文摹拟,未有所得,则于经学无补。总纂官纪昀《甲辰会试录序》言“设科取士将使分治天下之事也。……今之所录,大抵以明理为主。……貌袭先正而空疏无物、割剥理学之字句而恒订剽窃,似正体而实伪体者亦不取,期无戾于通经致用之本意而已。”<sup>[15](卷八 P2)</sup>这种“明理为主”、“通经致用”的理念,甚至在他的小说中也有论及,《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二》云“圣贤依乎中庸,以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道学则务语精微,先理气,后彝伦,尊性命,薄事功。”<sup>[11](P45)</sup>作为“万卷提纲,一手编注”的总纂官,<sup>[16](卷六 P137)</sup>纪昀反对空言无补的学术风气,其义理观很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对经书义理的发明阐释是否深切致用,是《总目》评价举业文献价值的标准之一。

其二,考据是举业文献评价的基本原则。考据与清代通经学古的学风取向相关,清初康熙时期就已十分盛行。对明人游谈无根风气的指斥,使得清初学者特别注重言之有据,尤其在经书义理的阐释上,力求名物考据的精确。自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至阎若璩、胡渭,再至惠栋、戴震等,采用考据方法治经,皆有所创获。清代八股文写作甚至也用考据方法,如《制义丛话》卷十记“任钧台先生深于经学。发而为制义,虽小题亦必用考据之法行之。”<sup>[17](卷十 P190)</sup>《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五十以后,颇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sup>[11](姑妄听之序 P1)</sup>纪昀注重考据,主持纂修的《四库全书》亦以考据为重,如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所云“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允。”<sup>[15](阮元序 P1)</sup>《提要》对“笃实以为本”的吕坤《呻吟语摘》等著述往往给予肯定,无所考证的那些著述则视为“经术之极弊”,如许兆金《说礼约》“于名物制度绝无考证”,<sup>[1](P306)</sup>杨方达《尚书约旨》“仅钻研语气,未能考证其失”“至于名物典故,不甚诠释”,<sup>[1](P182)</sup>在四库馆臣看来,不考据则事不明,事不明则理不精,这些无涉考据的举业文献无甚可取。

宋明举业文献也有专以考据为主的著述,但能否达到清代朴学家的标准和要求则另当别论。如薛应旂《四书人物考》尽管援引诸书,详述《四书》人物事迹,可四库馆臣认为“杂考《四书》名物,恒订尤甚”,其考证所据失实,不过是“褻积割裂,以涂饰试官之耳目”。<sup>[1](P485)</sup>客观来看,薛应旂作为明代八股文大家,编纂《四书人物考》为应举备考,其中的《四书》人物事迹均据史书纂成,并非如提要所说鄙陋不堪,只是语言通俗,颇类小说,与经书注疏风格大相径庭,虽偶有失考,但不至于达到“恒订”程度。清人任启运《四书约旨》等亦属此类。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具有考据性质的举业文献经常出现,清代乾隆时期甚至出现了“黠者因伪撰典故,以愚试官”的情况,<sup>[18](考试类 P41)</sup>很多举业文献,包括八股选文,名为考据经书名物,实则杂凑杜撰典故。提要对这类举业文献的批评实不为过。

其三,训诂是举业文献评价的主要参考。清代朴学远承汉学,尤重训诂,可以说训诂是义理阐释的基

本条件。就举业文献而言,随文释义、通释语义是其常见的形式,如清人王言《连文释义》为课蒙而著,全书分别训释,厘为十门,词旨浅近;魏裔介《孝经注义》分章诠释《孝经》,训诂字义标为“注”,敷衍语意标为“义”;明人林兆珂《考工记述注》、朱升《尚书旁注》等均随文训释。这种方式,即所谓“诂经之体”。

也有很多举业著述并不遵循“诂经之体”。比如明代陈际泰的《易经说意》,“说经亦即用时文之法,中间或有竟作两比者,自有训诂以来,一二千年无此体例也。”<sup>[1] [P102]</sup>清人翁汉麟的《春秋备要》,“至于书之上阑标破题,下阑标合题,则全非诂经之体矣。”<sup>[1] [P399]</sup>这些举业文献所释内容为时文八股,或讲论文题,或分析文法,意在为撰写时文提供范例,与传统训诂体式迥然不同,故提要认为“非诂经之体”。

训诂重在解释经典、阐发精义,除了“诂经之体”的形式要求外,是否做到了准确、精深,也为提要所关注。像《礼记辑览》以科举制度规定的《礼记》陈澧注为蓝本,不以事实为宗,这与清人重视证据的朴学思想相悖,因而为提要所贬抑。

明清科举制度下,举业文献与学术思想有着密切互动,《总目》对举业文献的范围界定、著录分类和评价标准,都源于四库馆臣朴学思想的导向作用,也能反映朝廷实行科举制度的初衷,诚如乾隆九年鄂尔泰所奏“凡此诸科,内可以见其本源之学,(外)可以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见之于施为乎?”<sup>[18] (考试类 P14)</sup>秉承经典、发明义理、谨严笃实,既是科举制度实行的本旨,也是清代朴学家的学术主张,更是四库馆臣评论举业文章之准的,纪昀《丙辰会试录序》云“经义昉于北宋,沿于元代,而大备于明,本以发明义理,观士子学术之醇疵。其初犹为论体,后乃代圣贤立言,其格主于纯粹精深,不主相矜以词藻。由明洪武以来,先正典型,一一具在,是又文章之一体也。”<sup>[15] (卷八 P4)</sup>举业文献集学术与文章为一体,既表明了编纂群体的学术主张,也呈现其所崇尚的制义文风。然而,自唐以来就已出现《兔园册府》等旨意浅近的举业文献,并流行于士人举子当中,在“旋生旋灭,有若浮沤;旋灭旋生,又几如扫叶”的举业文献发展过程中,“虽隶首不能算其数”,<sup>[1] [P499]</sup>这并不是庸陋鄙俚可以一语概括的,其复杂的编纂群体及其与主流知识体系的密切关联,都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

#### 参考文献:

- [1]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2]朱德润.存复斋文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2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 [3]曹安.谏言长语[M].四库全书(第867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4]李维桢.大泌山房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53册)[Z].济南:齐鲁书社,1997.
- [5]顾炎武.日知录集释[M].黄汝成集释.上海:世界书局印行,1936.
- [6]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何蘧.春渚纪闻[M].四库全书(第863册)[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8]徐松.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9]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3.
- [10]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启智书局印行,1933.
- [12]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 [13]俞正燮.癸巳存稿[M].丛书集成初编(第363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4]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光绪丁丑重校本.
- [15]纪昀.纪文达公遗集[M].清嘉庆十七年刻本.
- [16]朱珪.知足斋文集[M].丛书集成初编(第2512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7]梁章钜.制义丛话[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18]清稗类钞[M].徐珂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18.

(责任编辑:刘伏玲)